

騎兵軍

【苏】伊·巴别尔 著
孙 越 译



20

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总 序

我们正处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的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

果，前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和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文学发端于19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19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20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年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

创作实践，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美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

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尽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

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关于巴别尔及其《骑兵军》 的对话（代序）

贾 放

春天的夜晚，一阵阵东南风用力地叩打窗户，复苏的世界仿佛在以一种并不温柔的方式报告着它骚动的生命。灯光下，合上《骑兵军》的最后一页，一时觉得，书中充满的律动与身外这奔放的春天如此相应相和，一个在痛苦与喧嚣中孕育新生的时代这样坦露真诚地迎面走来……

在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艺术面前，无动于衷是很难的。

我渴望与人谈谈我的强烈印象，渴望更多地了解这本非凡的书和它非凡的作者。正好，书的译者就在身边，于是有了下面这场对话：

（我们曾以“方圆”的笔名合作过，这里权以“方”和“圆”作为我和他的代称。）

方：读了《骑兵军》，才明白“文如其人”这句话不一定准确。我读过一些同时代人回忆巴别尔的文字，他给我的印象是位圆圆的脸上戴副圆眼

镜，温和而敏感，书生气很重的知识分子，想不到他的小说这么厚重老辣，震撼力这么强。

圆：巴别尔的小说的确是大手笔。他那种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感受，那种有时简直令人费解但又极富于表现力的表达方式，把特定历史环境中芜杂纷繁的生活面貌、被战争扭曲的人那么赤裸裸、沉甸甸地凸现出来，其效果是只能用“震撼”二字来形容。

方：说到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我以为首先表现在巴别尔对描写对象的选择上，所谓作家的“心灵敏感带”。战争中一切都打破了常规，外部矛盾和人的内心矛盾空前强化，生活充满动荡和剧变，而《骑兵军》描写的国内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创建之初的挣扎搏斗，有新生命诞生的庄严神圣，同时也无法避免血腥污秽和苦难。由哥萨克农民组成的红军骑兵肩负着摧毁旧世界的伟大使命，但这支队伍本身并非“蓝色的多瑙河”，倒更像泥沙俱下的浩荡大江。在这样复杂的生活现象面前，摄取什么材料来再现历史的真实？《骑兵军》的回答显示了作者的身手不凡。巴别尔不热衷于描写大的战争场面，也不醉心于唱英雄主义的赞歌，吸引他的是通过触目惊心的个别事件展示出的战争的真实面貌，是这种特殊环境下人

的真实心理，哪怕很恐怖、很丑恶，他也善于发现内在的美。

圆：《骑兵军》的内容如它的题目所标示的，是刻画这支队伍的群体形象，揭示普通骑兵军战士身上理想与现实、残酷与人性、崇高与卑琐等等对立因素的冲突。对自己的描写对象，巴别尔没有洁癖，他坦然撷取最能表现人物心理和性格的细节，以至有人批评他自然主义。

方：我不赞成这种批评。写作要根据表现艺术真实的需要，我认为巴别尔是从冷静客观地再现生活全貌出发的。

圆：巴别尔（1894年生于敖德萨）从童年起所目击的生活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是他专拣残忍的东西写，而是生活中这种东西太多，回避不了。《一封家信》里，通过库尔久科夫之口叙述的故事——当白军的父亲一刀刀割死当红军的儿子，另一个当红军的儿子为哥哥复仇又杀死了父亲，阶级之间的厮杀投影到一个家庭里的亲人之间，事实本身就是很残酷的。

方：与描写战争残酷相关的是战争中的人道主义，这可以说是《骑兵军》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圆：故事叙述人“我”——知识分子留托夫与骑兵战士之间关系的描写似偏重阐发这一主题。比如

《我的第一只鹅》，“我”为了求得被骑兵们当成自己人，凶暴地杀了房东的鹅作晚餐，以粗野顺应粗野，因此被骑兵们纳为同志。但这种践踏他人和无辜杀生的行为却使“我”受到良心的谴责，夜里寝不安席，心在“哀号”，在“滴滴着鲜血”。这是用道义的尺寸衡量战争中司空见惯、甚至被作为美德的非人行为，流露着作者的痛心。

方：但同样是写留托夫与骑兵间的关系，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那就是：战争中的真假人道主义。多尔古绍夫身负重伤，不能随战友们一起撤退，他宁死不愿作俘虏受波兰人的侮辱，要求留托夫为他“浪费一颗子弹”，留托夫躲开了，但排长阿丰卡满足了多尔古绍夫的要求，并向留托夫叫骂道：“你们这些四眼儿，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一样……”任何一种道德准则对人的行为的规范都离不开具体的环境，在这种情形下，不是阿丰卡的手狠，倒是留托夫的心软成了对战友真正的残忍，巴别尔写出了战争中人道主义的特定的、具体的和多方面内涵。

既不粉饰也不歪曲，淋漓尽致地揭示生活与人的多面性，构成了巴别尔小说独特的艺术真实。

圆：艺术真实性却恰恰是《骑兵军》招来非议最多的问题。红军骑兵统帅布琼尼与高尔基关于《骑兵军》的公开论战，正是围绕作品真实性展开交锋，你有兴趣吗？

方：洗耳恭听。

圆：布琼尼早在1924年就指责过巴别尔的小说没有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真实形象。1928年9月30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了高尔基一篇谈写作的文章，论及果戈理的创作，他认为果戈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旧式地主》、《死魂灵》中描写了“可怕的真实”，而在《塔拉斯·布尔巴》中对查波罗什人的描写则是“一种美丽的谎言”。接下去写道：

“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同志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

“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一个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提高人的自尊心，有助于发展人对自己的创造力的信心。”

方：这是肯定了巴别尔的创作态度和真实性，肯定他写出了人物的内在美。那么，布琼尼的反应呢？

圆：布琼尼很快在10月2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进行了措辞激烈的反驳。他说巴别尔长期待在骑兵军的后院，“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因此没有权利写骑兵军。

方：但这并不符合人们——至少是我——从《骑兵军》得出的印象。看来，元帅的荣誉感和暴怒妨碍了他公正地对待一位艺术家和一部艺术作品。

圆：布琼尼彻底否定了巴别尔的创作态度，认为他不是——一个自觉的辩证论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艺术家。“正因为这样，在试图描写第一骑兵军的生活、组织和传统的时候，他的这种尝试才成了一种讽刺和诽谤……”

方：我看这段话带有二十年代“拉普”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味道。

圆：高尔基随后在11月27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答谢·布琼尼》，除了坚决抗议布琼尼这种批评态度外，就布琼尼涉及到的问题做了回答。关于说巴别尔只待在骑兵军后院，高尔基说：“这一点既无损于巴别尔本人，也无损于他的

作品，为了煮汤，厨师不必自己坐到锅里去，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并未亲身参加同拿破仑军队的厮杀，果戈理也不是查波罗什人。”

方：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如何回答布琼尼“讽刺和诽谤”的指责。

圆：他说：“我在巴别尔的书里并没有发现什么‘讽刺和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了我对骑兵军战士们的热爱和尊敬，因为它向我展示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这些无畏的战士们深深地意识到他们斗争的伟大意义。”

方：这才是公允之论！巴别尔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布琼尼的宣传干事，他是艺术家。而且，正是这段历史、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有足够的肯定和自信，巴别尔才有这份胆识，才能够不回避阴暗污秽的东西，写出事物本质的真实。

圆：爱伦堡在1957年为巴别尔作品集所作的序中说：“<骑兵军>中没有为革命作辩护，革命也不需要这样的辩护。<骑兵军>中的主人公有时残忍，有时可笑；他们身上洋溢着充沛旺盛的、春潮般的活力。然而他们为之奋战的事业的正义性渗透在整部书中，尽管无论作者还是书中的主人公都不曾提及这一点。”

方：那么，布琼尼与高尔基论战的结局如何呢？

圆：不可能得出什么最终结论。不过还有个尾声：

1929年维什涅夫斯基写了歌颂布琼尼骑兵军的剧本《第一骑兵军》，说是对巴别尔的回答。布琼尼亲自作序，大加赞扬。只是，几十年过去了，巴别尔依然为人称道，《第一骑兵军》却湮没无闻了。艺术品的价值似乎不是能由哪一个人的旨意规定的。

方：准确地传达出时代的氛围，创作出意味隽永的艺术图画，不仅关系到写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写，《骑兵军》艺术表现手法之高超独特令人叹为观止。

圆：巴别尔在创作谈中说过，他不满足于“什么”，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和怎么样”。

方：他走出了自己的路子。《骑兵军》没有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古典味儿，更富于动态的、冲突变化的现代美感，在不和谐中求得一种更高意义的和谐。巴别尔很擅长把对立矛盾的东西组织在同一个故事、同一个画面、同一个性格中，以强烈的明暗对比造成独特的效果，颇像英国画家荷迦兹所推崇的“错杂的美”，因为“它引导着眼睛作一种变化无常的追逐”。

圆：你看《骑兵连长特龙诺夫》这一段，刚刚用特写镜头描绘了杀俘虏的残酷场面：“特龙诺夫……把军刀插进俘虏的喉咙。老头倒下了，两条腿

动弹了一下，珊瑚般的鲜血像小溪似的冒着泡沫从他的喉咙涌出。”紧接着却是一个如此抒情的远景：战士安德留什卡剥下俘虏的衣服策马而去，“在这一瞬间，太阳钻出了云层。阳光一下照遍了安德留什卡的马，它快活地奔跑，它的秃尾巴无忧无虑地摇动”。再看《萨什卡·耶稣》，尽情写了萨什卡父子俩与要饭女人之间的肮脏放荡，接下去写父子俩回家的路上，却是四月的田野，“黑土坑里闪烁着绿宝石般的青苔。绿草在地上绣出一行行精巧的针脚。”“马驹在湛蓝的天边嬉戏”。互相衬托互相映照，大千世界的善恶美丑交迭变换地浓缩在尺幅之中。

方：《经师之子》里写犹太教教士的儿子，共产党员伊里亚的遗物，更是一幅绝妙的画面：“宣传员委任书和犹太诗人的纪念物。列宁和麦莫纳笛斯的像放在一起。粗糙的铁模子印制的列宁头像和绣在颜色暗淡的绸子上的麦莫纳笛斯像。一缕女人的头发夹在党的六届代表会议文献里，在党的传单的空白处歪歪扭扭地写满古犹太诗句。它们就像忧愁的、稀疏的雨点打在我的身上——那是几页《雅歌》和几发左轮手枪子弹。”每组物品包含的意义都是对立的，简直像一个个惊叹号，但这几组对立的静物就写出了

一个复杂的人。

圆：巴别尔善于用人物行为自身的矛盾揭示性格的多重组合。特龙诺夫公然违犯纪律杀俘虏，但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荣誉感又使他不能容忍安德留什卡抢劫俘虏衣物的行为，险些一枪毙了他；这位凶狠暴躁的指挥官在危急时刻却把生的机会让给战士，自己英勇战死，死前甚至没忘记把脚上的靴子脱下来送给机枪手。作者是用最大胆的色彩勾勒出丰富鲜明的性格层次。

方：小说从画面到人物，充满起伏跌宕的韵律和时而粗鲁时而温柔、时而明朗时而忧郁的俄罗斯味儿。

圆：巴别尔很欣赏果戈理的乌克兰小说，他那种在悲惨的情节中不时溢出的浪漫抒情气息和幽默感，以及鲜明饱满的色彩令人联想起早期的果戈理，但他更冷峻些。

方：简洁是巴别尔的另一大特点，他没有浮泛之笔，常常是用很富于个性特征的几句对话或几个动作传神地塑造出一个人物，或寥寥几笔点染出一种气氛。

圆：巴别尔很推崇法国作家莫泊桑、福楼拜。他自己的创作信条是：“在恰当时刻使用一个句号，比任何尖刀都能更锋利地刺入人的心窝。”

方：他的语言有很深厚的功力。

圆：译着《骑兵军》，我经常忍不住要击节赞赏。这的确是一位真正的语言大师！他喜欢用长短句交替的方式，造成一种抑扬顿挫的节奏。而且，他既精通有文化教养的优雅精美的语言，又熟悉骑兵战士夹着半通不通新词的大老粗话，运用得很恰当。

方：王蒙曾经说青年作家陈建功是挥着两把板斧上阵——既能写出京西工人的土味儿，又能写出地道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味儿。这么说，巴别尔也是左右开弓了？

圆：而且都得心应手。你看《意大利的太阳》中的月夜，写得何等情景交融！《经师之子》的开头也是写得奇巧优美。可你看《萨什卡·耶稣》：萨什卡的继父扔给要饭女人一个锃亮的五戈比银币，

“‘用沙子蹭蹭，信上帝的娘们儿，’塔拉坎内奇说，‘它还能更亮呢。黑夜里你把它借给上帝，这五戈比呀，能替月亮发光……’”

活脱脱一个粗鲁又带着俄罗斯人的浪漫幽默劲儿的庄稼汉，语调中还听得出玩乐之后的满足和施主的优越感，人物性格包括当时的情绪活灵活现。

方：语言的风格化和个性化的确是《骑兵军》十分突出的特色。